

榮譽理學博士

Shankar Balasubramanian爵士

讚辭



Shankar Balasubramanian爵士於1966年生於現稱Chennai市的印度Madras市。翌年，他父母攜他遠渡重洋到英國，在Cheshire市內的Runcorn鎮邊陲定居，此鎮現已納入利物浦市，教授的童年就在此區度過，相信很多人會因此羨慕他。1967年，利物浦市平地一聲雷，憑藉市內出色的搖擺樂隊，迅速爆紅，瘋魔全球。而披頭四樂隊在此推出其最具代表性的唱片專輯：*Sergean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內有兩首劃時代的歌曲，其中一首是*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此曲脫胎自Lewis Carroll的*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提起Carroll這名字，很多人就聯想到牛津，但Carroll的出生地並非牛津，而是Daresbury這教牧區，與Daresbury小學相隔只是數步之遙。Balasubramanian教授啟蒙於這所小學，而他和家人在這充滿創意的環境下揭開了人生新的一頁。

其後，教授轉往Appleton Hall中學升學，繼而於1985至1988年在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學院（Fitzwilliam College）修讀自然科學，考獲一級榮譽學士學位，現在回想，這初期的成就已清楚顯示教授的學術潛力。畢業後教授繼續在劍橋深造，追隨Chris Abell教授鑽研酶（又稱酵素）化學（Enzymes Chemistry），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在事業軌道上邁出重要一步。酶是可對各種化學反應產生催化作用的生物分子，撮合及加速分子與分子之間的化學反應（但過程中其質與量絲毫無損，歷久不衰……）。

在日常生活中，酶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的身體由細胞構成，而個別細胞內的新陳代謝反應都有酶的影子，否則，所有這些反應皆會因為速度太慢而不能維繫生命。舉一個極端的例子：若有一種酶能將平常需時數以百萬年計的發酵過程縮短為千分之一秒，這種酶定必成為製藥的良方——不論良藥或毒藥。氰化物（俗稱山埃）當與名為C細胞色素的酶起作用，可堵塞細胞內的主要氧代謝通道，即能在瞬息間致人於死地。幸而我們的榮譽博士領受人絕不是一位施毒者，他的酶研究工作初衷是將成果惠澤眾生。他從研究中找出鑰匙開啟我們的遺傳密碼，不單是你的或是我的，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體內的不同基因表達（expressions of genes）。教授是如何達致這研究目標的？

在1991年，Balasubramanian博士離開劍橋，由東往西橫渡大西洋，跟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Stephen Benkovic教授做博士後的研究，為時兩年，這亦是教授生平僅有的一次離開劍橋。教授緊隨四分之一世紀前Harvey Lodish教授的軌跡，繼續酶的研究工作，並和Benkovic教授合作，共同出版了數篇學術文章，集中研究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抽取出來的一種酶，文章發表後得到其他學者廣泛的引述。可是，賓夕法尼亞雖具魅力，劍橋毫無疑問更具吸引力（說真的，劍橋的吸引力有時在牛津也感受得到）。當時英國皇家學會開始提供研究獎學金，讓英國大學設立研究員席位，招聘嶄露頭角的年輕科學家，進行獨立創新的科研項目，這無疑是條光明大道。為此，1994年再見Balasubramanian教授回歸劍橋，亦是他最後的一次，自此教授長居此地。

脫氧核糖核酸（DNA）的神秘結構是在劍橋解開的。這個發現提供了一把鑰匙，得以開啟一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新境界。可是要令這些可能性變成現實，甚至只是一窺，更遑論要去塑造這些可能性，我們都必須找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去解讀這些DNA中蘊藏的遺傳密碼，繼而尋找操控它們的方法。在劍橋，Fredrick Sanger教授在這領域踏出關鍵性的第一步，他找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去解讀甚或列序DNA。Sanger教授的方法使他第二次獲頒諾貝爾獎，是項發明亦令「人類基因組計劃」（The Human Genome Project）得以進行。這項劃時代研究項目始於1990年，歷時十三年多，耗資三十億美元以上，其目標是於2003年至少完成DNA測序工作的初步報告。但是，當這個龐大的國際性科研項目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在劍橋，相關的研究工作已為該項目打下基礎，把相若的科研項目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速度。Balasubramanian教授在返回劍橋後，在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作研究員，與牛頓隔代

輝映。他與David Klenerman教授共同研究DNA聚合酶（DNA polymerase）。聚合酶乃一種可促成產生生物聚合物的酵素，令人體內較細小的同類分子聚合成為一羣龐大的生物分子。憑藉這研究工作，他們發現將DNA結構列序的新方法，日後並將此方法應用到普及層面。

摩爾定律（Moore's Law）預言電算機運算能力每十八個月便會倍增，但教授新DNA列序方法所產生的變化更巨大。DNA的列序工作，不久前仍需依賴龐大和持續的國際項目，然而，藉著教授的新方法，現只需少於原來的百萬分之一的成本，而且速度快一百萬倍。電算機運算能力的提升當然是原因之一，但若沒有教授的新方法，我們可能需要更長日子，才能成就列序DNA這艱鉅任務。Balasubramanian教授所研發的新方法，對此項研究至為重要。

Dominus illuminatio mea，意思是「救主是我光」（The Lord is my light），是牛津大學創校以來的校訓。但在今天，很多科學家和臨牀醫生都可能說*Illumina dominus meus*（*Illumina*是我主），因為以*Illumina*為名的一所科研公司，採用Balasubramanian教授和Klenerman教授的科研成果為核心技術，為客戶提供新DNA序列方法，不單準繩度高，且快捷可靠，而更重要的是收費大眾化。如這技術不存在，大多數現代的產前診斷檢測或癌症診斷均不可行。教授的研究成果對科技和病人福祉實乃一大貢獻。至此，或許你認為我將用一兩句說話，作為此讚辭的終結，以表揚教授的貢獻。不對，我還有話說。

我們的基因全在我們的DNA內，基因把我們塑造成「人」，並決定我們可傳承甚麼給下一代。然

而人體不同部位的組織是不一樣的，如皮膚、肝、牙齒、腸道、味蕾、頭髮和大腦：所有這些不同的組織，皆由相同的DNA所控制；這是因為人體內的基本基因，在這些組織的生長過程中，能按著特定調控機制，不斷打開及關閉。這些高階的調控機制，亦受人體遇到的不同境況所影響，包括環境因素或藥物作用等；基因開關造成的改變，以及受影響的基因，一部分都會傳承給下一代，以至代代相傳，影響我們兒孫的個別基因表達。上述的過程就是所謂「表觀遺傳變化」(epigenetic changes)，這現象亦為遺傳學開創了新的學章。這些表觀遺傳變化，並不出現在基因本身，而是指基因可以造成影響的能力，就如不斷就DNA發出的訊息作出旁白一樣。維根斯坦曾有此一問：「若獅子能說話，我們可會聽懂牠的話？」（最佳答案當然是「不」）。除非我們了解表觀遺傳學及遺傳學，否則我們不會明白蘊藏在DNA內的密碼。為此，你會明白為什麼Balasubramanian教授並不對他在傳統DNA列序的研究成果自滿，而是再接再厲地把他的研究方向聚焦於「表觀遺傳列序」(epigenetic sequencing)。到目前為止我只能對教授的研究說個大概，但應已足夠讓你們聽到2012年教授已為表觀遺傳列序這領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而感到驚訝，同時亦對教授的研究能力深感佩服。他的研究成果，亦藉一所公司轉化為社群服務，讓基本生物學家及臨牀醫生受惠。能開花結果的創意構想，必然是最有價值的構想，而教授的表觀遺傳列序研究是其中表表者，亦為個人化診治帶來美好的願景，及隨之而來的眾多好處。

Balasubramanian教授所獲榮譽與嘉許無數，今天的榮譽博士名銜只是教授眾多榮耀之一，大學與有榮焉。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理學博士銜予Shankar Balasubramanian爵士，「一位利用螢光照亮人類傳承的智者」。

榮譽理學博士

John Irving Bell爵士

讚辭



John Irving Bell爵士乃享負盛名的醫學家，現為牛津大學皇家醫學教授。此職位為英王亨利八世所創，故此帶着皇家頭銜。談到亨利八世，他最廣為人知的事跡當數其多次立后，又旋即廢之，但他為婚姻煞費心思之餘，其實亦積極推廣學術。他在牛津和劍橋各設立了一所學院，兩者至今仍然財力雄厚。在這兩所學院中，他又各創設五個皇家教席，促進牛劍兩校擺脫神權，面向世俗。這些教席的任命權，如今仍在英國君主手中。皇家醫學教授席雖非牛津最早設立的冠名醫學教授席——最早的可追溯至威廉主教（William of Wykeham）於1379年設立的新學院——卻是地位超然，也是醫學院的學術之首。

當然，教席的高低與才幹並無必然關係。在位三十年，十九世紀的皇家醫學教授之一John Kidd便發表過充滿哲理的意見，認為建基於觀察的科學，不能確切推論事物的因由，因而在無可爭辯的神諭面前，理論地質學等的學說不堪一擊。然而早於三個世紀前，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已在意大利帕多瓦（Padua）宣揚以演示傳授醫學、以觀察為判斷依歸的治學原則。過了半個世紀，又有William Harvey將這套基於實證的原則，由帕多瓦大學帶回英國，繼而傳至牛津。Harvey主張解剖學不應以經籍和辯士的言說為圭臬，而是要基於扎實的解剖工作和大自然的實況。緊接Kidd出任皇家醫學教授的是James Ogle，但他傳世的就只有這麼一封於1841年寫給華德漢學院（Wadham College）院長，論革新考試制度的信。我們從那蒙昧的時代走來，確實進步了不少。

Bell教授乃牛津第三十位皇家醫學教授，亦是第三位出任此職位的加拿大人。加國首名擔任此職務的人是William Osler爵士，他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四位創院教授之一。Osler常被稱為現代醫學的奠基者之一，影響力可比維薩里。牛津大學固然是一流學府，其醫學院卻一直偏小。話雖如此，學院的影響力，卻大大超越了它的規模。William Osler爵士和John Bell爵士兩位，均為來自大西洋彼岸成就非凡的皇家醫學教授。

John Bell教授1952年生於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愛民頓市（Edmonton），年僅十四歲便遠赴安大略省（Ontario）就讀利禮賢書院（Ridley College）。這所中學一直以划艇聞名遐邇。它是第一間加

國學校於英國泰晤士河畔亨利市舉辦的「皇家划艇賽」（亨利賽）（Henley Royal Regatta）中榮獲伊利沙白公主杯冠軍。1969年，John Bell成為書院划艇隊一員，並在書院首次贏得亨利賽的1970年以及翌年，參加一百四十五磅輕量級團隊賽。教授對划艇的熱愛至今不減。他擁有一艘極盡精良與時尚的賽艇，經常穿梭於居所旁邊的泰晤士河。

John Bell教授於利禮賢書院畢業後，返回家鄉愛民頓市，升讀亞伯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此處是最多加國「羅德學人」出身的學府，教授也位列其一。他於亞伯達大學獲醫學學士學位後，轉赴英國牛津大學進修。「我1975年10月抵達牛津時，天氣反常地冷，其時大學的雷德克里夫理科圖書館（Radcliffe Science Library）還未開始供應暖氣。我要穿著大衣和手套備課，而我在牛津買的第一樣東西是羽絨被。我記得當時在想，也許我不會在此地久留了。」牛津大學的教育，廣袤而不拘小節。加拿大人和俄羅斯人自以為深明嚴寒的滋味，那是因為他們還沒在牛津的書院生活過。不過，天寒地凍絕不是教授牛津日子的全部。

儘管冷不可耐，教授仍於1976年以生理科學一級榮譽成績於牛津畢業。四十五年過去了，教授的書院導師，亦是我的朋友，仍沒有忘掉他，並憶述：「我們在討論有關『霍奇金—赫胥黎方程式』（Hodgkin-Huxley equations）時，他就方程式內的一些細節，巧妙地糾正了我，令我心生敬佩。要知道，他當時並沒有修讀生物物理學，只是修了免疫學等科目。我頓時意識到，這小夥子能教我的遠比我能教他的多。」不久，教授便於1979年獲牛津頒授內外全科醫學學士學位。常人可能由此推斷，教授興許是個不折不扣的書獃子，只懂潛心學問，但實情是，教授於百忙中，亦抽空參加1978年度「牛津劍橋周年划艇賽」輕量級賽事。這也許是教授的取暖妙法？

醫科畢業後，教授先後在倫敦及牛津接受臨床訓練，繼而踏出人生另一大步，轉往史丹福大學的Hugh McDevitt實驗室工作，達五年之久。此實驗室以研究「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MHC）馳名於世。MHC是啟動人體免疫系統以辨認自身和異體物質的一個重要成分。免疫系統的功能，主要是找出外來的病原體，並加以消滅。若MHC功能失調，可釀成自體免疫性疾病，其特徵是人體的異常免疫反應，會對身體發出致命攻擊。人體免疫系統及基因組學，是教授的研究專長，他初期的研究聚焦糖尿病及類風濕性關節炎這兩個範疇，成就斐然，影響深遠。他的研究工作，由此起點，穩步向前，並邁進個人化醫療學的關鍵層面，包括更精準地運用較少副作用的治療藥物，以及應用鑑別診斷的管控方式來治理癌細胞的擴散。與此同時，教授亦致力研發新疫苗，此等科研，現今實為當務之急。

加利福尼亞的誘惑終有褪色的那一天，而美國西岸亦漸容不下鴻鵠。與此同時，牛津大學由David Weatherall爵士新成立的分子醫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Molecular Medicine）活像一個強大的磁場，把教授牽引回牛津，自此平步青雲。回歸後短短三年，他繼David Weatherall之後出任Nuffield臨床醫學教授席位，繼而成功為牛津大學惠康基金人類基因研究中心（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Human Genetics）爭取首批資金。該中心於1994年正式啟用。自此，教授在中心策劃和推動連串的研究項目。在他努力下，中心成為牛津校園內生機勃發的醫學研究重地，其研究項目不單碩果累累，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延伸至「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的範疇及醫療政策的制定。2000年，David Weatherall爵士退休，由John Bell教授接任皇家教席。（他原來的教席則由Peter Ratcliffe爵士補上。2019年，Peter Ratcliffe獲頒諾貝爾獎。）

在教授出任皇家教席期間，牛津醫學院聲譽日隆。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連續九年列牛津醫學院為全球優秀醫學院之首。牛津醫學院影響力不但遍及全國，更伸延至世界各地，在流行病學、熱帶醫學、瘧疾治療和抗瘧疾藥物的研發等範疇，皆聲名顯赫。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各界競相研發疫苗之際，牛津醫學院更是一馬當先。牛津的研究項目RECOVERY，是芸芸參與藥物臨床測試的項目中規模最大。同時間，牛津的「疫苗研究項目」雄心勃勃，不但進展神速，而且縝密周全，生產目標全球化，並確保以合理價格發售。新藥的研發，亦採取了嚴謹的審批程序，力求卓越。無論結果如何，此類藥物疫苗研發，甚為依賴成熟的基礎設施和穩妥的各階段研發程序。除此之外，研究的靈活性及能耐，及與持份者協商的高超技巧，皆為研發項目有效結合所有資源的必要條件。研究主管更須獨具慧眼、高瞻遠矚、開明公允，此等領袖特質正是皇家教席學者的必備質素。理所當然，這傑出的領導才能，使研究所的影響力遍及牛津鄰近地區、英國全國，乃至世界各地。

John Bell教授乃英國生命科學倡議人（UK Life Sciences Champion），直接向首相府報告，並負責審視撰寫英國生命科學產業策略報告書（UK Life Sciences Industrial Strategy Report）的工作。他曾是英國醫學科學院會長，現為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他亦參與各公私營諮詢機構的工作，地域遍及加拿大、丹麥、法國、新加坡、瑞典和英國本土，並出任三所生命科技初創公司的始創董事。教授在眾多公職上的出色表現，為他帶來不少殊榮，包括：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同年獲授騎士勳銜；2015年獲頒爵級大十字勳銜。和上述公職及勳銜相比，他的其他職銜，如羅德基金董事會（Rhodes Trustees）主席及牛津大學划艇會資深會員，也許顯得平平無奇。但我敢打賭，對教授來說，在2003年牛津劍橋划艇賽

中，牛津僅以一呎之差勝出；在這四又五分一英哩為時十八多分鐘的賽程，箇中產生的緊張、焦慮、賽後的如釋重負，以及勝出後的滿足感，絕對能和教授的治學、管理和公職經歷相提並論。

教授所屬的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與他的皇家教授席位一樣，皆由亨利八世設立。在學院入口處，懸掛著一台全英最大的古老巨鐘——「湯姆大鐘」（Great Tom）。這大鐘來自學院鄰近的奧斯尼修道院；亨利八世曾縮減修道院規模，開源節流，以增國庫。湯姆大鐘遠近馳名，每晚於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九時零五分鳴鐘一百零一響——一百零一響代表學院初年的一百名學生，到了1663年名額增加多一位。鳴鐘乃是校園宣布宵禁開始。（位於倫敦的格林威治約在牛津以東六十英哩，以兩地經度上的差距，校園鐘聲響起時，正好是牛津晚上九時正。以倫敦時間為準，其實不過是十九世紀時，英國人為方便編制火車時間表的權宜之計，緣何獨尊？）

湯姆大鐘高懸在學院入口傲視群雄，但如今不再獨領風騷。主席閣下，我深感榮幸，在此鄭重介紹聲名遠播如巨鐘的學界巨擘，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理學博士銜予John Irving Bell爵士。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陳一丹博士

讚辭



《說苑·談叢篇》：「明者視於冥冥，智者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意謂真正的睿智之士，每能於思潮尚未成形之時，洞見先機，預見未來，然後勇於變革創新，最終成就偉大事業，引領時代，福蔭萬民。

陳一丹博士，本科畢業於深圳大學，1993年獲頒應用化學理學士學位，於1996年獲南京大學經濟法碩士學位，並於2019年獲新加坡管理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學位。自九十年代初，深圳大學於正門建有時光廣場，在一片青蔥的草地上，聳立了一座大型日晷，日影流轉，四時更替，提醒莘莘學子歲月流逝，不捨晝夜，年一過往，何可攀援？這景象深深啟發了陳博士，他深明只有應時而動，及時而行，方能脫穎而出。1998年他與馬化騰先生等四位深大同學，眼見國內互聯網社交平台發展尚未成熟，毅然合資創立騰訊，陳博士並出任騰訊首席行政官。時至今日，互聯網已成為人際溝通的必然工具，而騰訊更成為中國服務用戶最多和市值最高的互聯網企業，員工超過五萬人，市值超過三萬億港元，在中國乃至全球的互聯網企業中，享負盛名，舉足輕重。《呂氏春秋·首時篇》說：「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陳博士深明時機之道，清晰預見時代發展，成就豐功偉業，贏得資訊行業的一致讚譽，商界推尊，士林望重。

智者高瞻遠矚，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而心繫蒼生。在騰訊集團事業發展如日方中之際，陳博士毅然於2013年卸任首席行政官職務，轉任騰訊終身榮譽顧問，旨在集中精力推展互聯網公益事業。陳博士深悟公益事業關係社會安寧、人民福祉，常思如何利用現代科技博施濟眾。早於2007年，他已聯同騰訊控股幾位創辦人，攜手成立中國互聯網界首個慈善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藉此回饋社會。陳博士更親自領導騰訊企業社會責任戰略規劃，積極推動利用互聯網平台進行公益慈善事業，成為第一位獲得「中華慈善獎」的互聯網企業家，獲頒中華慈善獎「最具愛心慈善楷模」及「中國十大慈善家」，更被譽為「中國互聯網公益教父」及「中國互聯網公益第一人」。

陳博士除專注慈善公益事業外，亦關注知識產權、版權保護及專利技術之維護。2006年，陳博士發起籌劃深圳首家版權保護組織，成立深圳市版權協會，並出任創會會長，現為終身榮譽會長。他亦擔任

多項社會職務，包括中國版權協會副理事長、中國社會工作聯合會企業公民委員會榮譽副會長、中國互聯網協會政策與資源工作委員會委員、廣東省第十二屆人大代表。自2018年起，出任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組委會主席。

《孟子·梁惠王》嘗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以為「庠序之教」即為愛民之道，陳博士對此深以為然，因而最重教育。2009年起，他投資創辦武漢學院，成為一所國內非牟利民辦公益大學，並捐建圖書館及典藏。2012年，透過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慷慨捐資興建田心中學高中部慈英樓，並設立獎學金。2013年捐資在深圳成立「深圳市陳一丹公益慈善基金會」，透過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的捐贈，成立深圳明德實驗學校，並任首屆校董會主席。自2018年起，出任西湖大學創校校董會成員。他更於2016年慷慨捐貲二十五億港元設立全球最具規模的教育獎項「一丹獎」，旨在表彰及支持教育創新事業，並表揚對教育事業卓有貢獻的人士或團隊，鼓勵社會思考創新教育理念，與時並進，俾使庠序之教可以歷久常新，延綿不絕。他同時捐贈一百萬美元在美國史丹福法律學院設立獎學金，以資助符合條件之中國學生赴美學習。陳博士重視教育，仁心仁德，贏得舉國讚頌，為此屢獲殊榮，他在福布斯中國慈善榜（2017年）位列榜首，在第十三屆中國慈善榜慈善家榜（2016年）同樣位列榜首，中國慈善聯合會發佈，陳博士成為中國首善（2015年）、第九屆中華慈善獎「最具愛心捐贈個人」殊榮（2015年）、「中國兒童慈善獎：感動春蕾」（2014年）。中國版權事業卓越成就獎（2013年）、全國知識產權保護最具影響力人物（2012年）、中國兒童慈善獎：傑出貢獻獎（2012年），並於2017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授予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榮譽光寵，紛至沓來。

陳博士對香港中文大學同樣眷顧有加，自2012年起，通過騰訊控股及其附屬公司，多次捐資中大工程學院學系，以支持相關之研究工作，建樹良多，本校師生同蒙沾溉。

主席閣下，本校已故校長高錕教授於六十年代率先發表論文，提出利用光纖可以高速傳遞訊息，為互聯網的誕生，提供了先設條件；九十年代，高校長更在中大創立了工程學院，推動本校資訊工程的教研發展。在相近的時空下，陳博士在深圳開始利用互聯網創建全國最具規模之多元網絡社交平台，及後更利用互聯網推展龐大的公益教育事業，貢獻社會，成就卓越。他同時慷慨捐贈本校工程學院多個學系，本校師生多蒙恩澤，同表謝忱。陳博士慧眼高瞻，睿智不凡，他為互聯網的應用，提供了最具社會意義的典範楷模，影響深遠，意義深遠。今天，我們在中文大學向陳博士頒授榮譽學位，可謂別具深意，淵遠流長。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陳一丹博士。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理學博士

Harvey F. Lodish教授

讚辭



學術生涯脫離不了建立「結連」：我們每每把不同領域的知識及科技結連起來，以獲得不同的啟示及嶄新的結論。當我們察覺到新的結連時，便可從中勾勒新的預測、假設，及至定律。牛頓有關「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言論，正好印證我們和過去的結連，並同時肯定我們傳承自前人的豐盛智慧。當然，結連亦指現今科研人員之間，以至不同機構之間日趨頻繁學術協作項目的聯繫。能掌控及適度運用這些結連，是推動研究向前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亦至少有三種更深邃的結連，足以決定研究項目所產生的價值。一是結連科研後進的能力，這不但指吸納他們投入研究項目，更需要在過程中傳授科研工作的竅門，甚或將整個研究項目付託予年輕的科學家，讓他們一展所長，茁壯成長，日後能獨當一面，在科研界發熱發光。另一層次是學術界與現實世界的結連，亦是把科研成果轉化，服務社群。當然，我們亦希望有一天，基於我們的努力，後來者可站在我們的肩膀上，高瞻遠矚。（至於不從事學術研究的，亦當受惠於我們致力授與的思辯方式以及在生活中其他層面作出的改善。）

今天獲頒榮譽學位的Harvey Lodish教授，是一位「結連大師」。他的治學生涯始於一間優秀的博雅院校：Kenyon College，位於美國俄亥俄州Gambier小鎮上，是一所擁有悠久歷史及人材輩出的學府。學院成立於1824年，創辦人名Philander Chase（是一位美國聖公會主教，其英文名字有調戲婦女之解，當此反性侵運動潮流下，相信再無人敢以此為名）。學院建校經費多來自英國的資助，並獲英國Kenyon勳爵首肯，冠以勳爵之名。Gambier這小鎮的名字，亦源自英國艦隊上將Gambier勳爵（他在英國皇家艦隊的別號是「憂鬱Jimmy」）。比前述兩位較為被Kenyon College的員生忽略的是另一位英國人Jane，Rosse伯爵太夫人，是學院最慷慨的一位捐贈者。伯爵太夫人家族世居於愛爾蘭的Birr城堡，比Kenyon或Gambier的家族更顯赫，成員均是出色科學家和發明家；他們當時所建造的反射望遠鏡，七十多年來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望遠鏡。蒸氣渦輪亦發源於Birr城堡。家族的第三世伯爵是英國皇家學會會長。伯爵的兒子設計和製造了首部蒸氣推動輪車。於1869年8月31日，距今整整150年，這輪車在拐彎時衝上路肩，因而導致車內一名乘客被拋離車廂，不幸即時死亡；這名女乘客是世界有記載以來首名車禍死者。（她芳名Mary Ward，是我伴侶的曾祖母，於我來說亦是一種「結

連」。) Rosse伯爵太夫人的慷慨饋贈，何其巧合，造就了現今一位出類拔萃的科學家！

Lodish教授本科主修化學和數學，以最高榮譽成績畢業於Kenyon College。畢業對他而言，並不等於離開Kenyon。四分一個世紀之後，他成為該校校董會成員，自此服務長達二十年。他現在是該校榮休校董，象徵著與母校一種永恆的結連。

在1960年代初期，一位富冒險精神，兼具備驕人學歷的本科畢業生，下一步會怎樣走呢？Lodish教授選擇了生命科學這門學科，踏出他事途上不平凡的一大步。事後看來，他選擇對了。生命科學顯然具備無比潛質，極需廣納化學和數學專才，合一眾精英之力，以期藉著這學科之前十年的飛躍進步，再闖高峰。當中，遺傳學的發展更令人矚目；而這正是讓教授一展所長的範疇。美國Rockefeller研究所，初期專注於探索公共衛生這門學科，其後則轉向細胞生物學的研究，因而極需羅致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再者，遺傳學亦是研究所的強項。結果，Lodish加入研究所 Norton Zinder博士的實驗室深造。實驗室當時正進行創新的研究，對象是噬菌體 (bacteriophages¹)，包括它們的基因結構，以及它們操控細菌基因組合的能力。噬菌體這羣自然基因工程師，在當時抗生素抗藥性出現的年代，備受研究員的關注。Virgil²曾說：「*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亦即是說「儘管希臘人攜同禮物而來，我仍心懷恐懼」。噬菌體的體積微細，如「特洛伊木馬」³ (Trojan horses) 般潛藏在人體眾細胞內。儘管Virgil對「特洛伊木馬」心存恐懼，但如果我們能管控噬菌體這羣纖細的「木馬」，或許會帶給我們一些好處。時至今天，我們仍可從教授實驗室的研究項目見到，細胞與細胞之間互傳訊息，以及利用微細的自然載體，把藥劑載至以前無法到達的人體部份等概念。

Rockefeller研究所升格為Rockefeller大學不久，Lodish也取得博士學位。這位年輕有為的科學家下一站將會是哪裡呢？位於劍橋大學的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轄下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LMB)，正好是教授的不二之選。毫無疑問LMB是當時首屈一指的一間生物學研究所。在1962年，研究所兩位教授Crick和Watson⁴共同獲頒授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表彰他們在解讀脫氧核糖核酸 (DNA) 的結構有驕人的成績。在同一個諾貝爾獎頒授典禮中，Kendrew和Perutz⁵兩位教授亦共獲化學獎，他倆解構了肌紅蛋白 (myoglobin) 和血紅蛋白 (haemoglobin) 的結構。(Sanger⁶教授在四年之前，獲頒他首個諾貝爾化學獎，直至1980年，Sanger教授再獲得第二個諾貝爾化學獎)。當時Crick教授在LMB與Sydney Brenner教授⁷一同工作。Brenner教授來自南非，是一位深思熟慮，機智風趣的人。Brenner亦是所謂「噬體團隊」(the phage group⁸) 的重要成員 (亦因此與Rockefeller研究所的Zinder教授結連起來)，Brenner教授2002年獲頒諾貝爾獎，2019年離世。上文所述的傑出學者，均曾與Lodish教授在科研領域上有過交會的時刻。英國劍橋這個學府，對一個醉心於蛋白質結構和遺傳學研究的博士後研究員來說，實在是千載難逢的學術聖地，亦是其他科學家科研靈感的泉源。

Lodish教授其後由英國的劍橋輾轉來到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劍橋；自1968年開始，教授長居此地。初期教授在麻省理工的生物學系任教，其後轉往附設於麻省理工的Whitehead生物醫學研究所工作。教授乃Whitehead研究所的創始成員之一，亦是麻省理工生物工程學教授。他的研究範圍涵蓋蛋白質合成及結構，尤其專注於醣蛋白質 (醣朊, glycoproteins)，一種可看成是糖也可看成是蛋白質的物體。這些形態複雜的分子可經褶疊而變更形狀，並由此可改變它們的生物化學特質。駭人聽聞的瘋牛症，源於患者不幸

進食了牛隻受感染的部位，導致患者腦蛋白質錯誤的褶疊，從而破壞腦部的結構。帕金森氏症亦可能是另一個腦蛋白質錯誤褶疊的例子。蛋白質構象對人體來說，至關重要。Lodish教授的研究所尤其專注於紅細胞（又稱紅血球）的研究，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的研究，顯示紅細胞這微細的物體可用作治療疾病。教授的研究亦關注紅細胞和脂肪細胞在治療過程中的轉變，兼且研究在它們演化過程完結後，如何變更它們的結構特徵。所有上述科研項目皆觸及基因功能和蛋白生物學，並將研究與個人健康與疾病結連起來，特別是罕有疾病的治療方法。罕有病患者，應如其他病患者一樣，在社會獲得同等的關顧；但是治療罕有疾病藥物的研發工作，卻往往因成本效益的考慮，被巨擘藥廠放棄。Lodish教授共成立了七間生物工程公司，其中三間的股份可在股票市場上交易。這三間公司是：Genzyme、Millennium和Rubius。他亦撰寫了600多篇經同儕審閱的學術論文；並且是《分子細胞生物學》（*Molecular Cell Biology*）的主筆。此書在大專界生物學科被視為一本權威的教科書，已發行至第八版，並翻譯成十二種語言。教授上述的研究及著作，為全世界帶來實實在在的裨益。在八十年代，Genzyme公司在他帶領下利用酶（又稱酵素）替代療法，治療高雪氏症（Gaucher Disease）。高雪氏症的癥狀是患者身體失去降解某些脂肪物質的能力。十五年後，晴天霹靂，教授其中一個孫兒Andrew，竟不幸罹患此症。Andrew 現已十六歲，過去六年，在祖父協助研發的藥物治療下，成功康復。對教授而言，這個科研的成果，本意是服務大眾，卻無心插柳地拯救了他的孫兒，真是一個奇妙的結連。

細胞自有其發展譜系，科學家亦然。超過半個世紀以來，Lodish教授把自己在科研上獲取的知識和經驗，與及在事業上建立的人脈網絡，毫不吝嗇地與同儕分享。在科研界他是一位備受推崇的前輩，亦是一位出色的導師。算得上宗師的，是除了作出重大發現外，更能推動及啟發他人作出同樣的創舉。

他們亦將研究探索的動力，及與同儕分享成果的善意，結連起來。他們廣闊的胸襟，不單為自己帶來榮寵，更重要的是可引發更多新的研發成果。有達二百多名的科學家，曾先後加入麻省理工Lodish的實驗室工作，團隊的科研成就非凡，廣受各界敬重，其中兩位成員更分別是諾貝爾獎和Lasker Prize⁹的得主。Lodish致力為實驗室引進優秀的年輕科學家，並確保他們能茁壯成長。凡此種種，皆建基於教授把實驗室營造成一個大家庭，研究員不論資歷，皆彼此互助互愛。在教授的實驗室，孩子不是負累，事實上，身兼父母天職的研究員，表現更為出色。Lodish教授的嘉言懿行，使他榮獲2017年美國細胞生物學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頒發的「細胞生物學資深好領袖獎」（Women in Cell Biology Senior Leadership Award¹⁰）；在此之前他亦獲美國血液學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Haematology）的導師獎（Mentor Award）。

David Hume¹¹曾說：「只須結連」。但他應可以作更詳盡的解述。事實上「切割」在科研上亦有其角色。Lodish教授與他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的師生觀念非比尋常。他向來都是從旁默默地支持指導他們，讓他們獲取應得的研究成果；同時亦經常籌組學術研習活動，讓他們擴展科研網絡，促進合作交流，落實教授「切割」的角色。總而言之，他的門生不但參與研究過程，事後還能分享成果。

Harvey Lodish教授是一位微小物體工程師，一位結連大師，更是一位慷慨的「切割」君子。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理學博士銜予Harvey F. Lodish教授。

¹ 噬菌體是一種可感染細菌的過瀰性病毒，俗稱「啃噬」細菌的病毒。

² Publius Vergilius Maro，通稱為Virgil，是一位古羅馬詩人。

³ 希臘神話「木馬屠城記」中送入特洛伊城的木馬稱為「特洛伊木馬」。

⁴ Francis Crick和James Watson兩位教授獲獎時分別隸屬英國劍橋的LMB和美國麻省劍橋的哈佛大學。

⁵ John Kendrew和Max Perutz兩位教授獲獎時同隸屬英國劍橋的LMB。

⁶ Fredrick Sanger教授1958年第一次獲獎時隸屬英國劍橋大學，當時LMB仍未成立。他1980年第二次獲獎，已隸屬LMB。

⁷ Sydney Brenner教授是一位分子生物學家，隸屬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分子科學研究所。2002年他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時，在LMB工作。

⁸ Phage group是由Max Delbruck（美國Caltech教授，1969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牽頭組成的一個非正式的研究小組，小組成員主要是生物學家，專門研究細菌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

⁹ Lasker Prize常被喻為美國科學界的諾貝爾獎。

¹⁰ 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每年皆頒發三個獎項，首兩項分別頒予少於7年及7至15年研究經驗的女科學家，第三項則頒予資深的科學家，不論性別，以表揚他們的研究成果及扶掖後進的嘉行。

¹¹ David Hume是18世紀至19世紀初蘇格蘭啟蒙時期（Scottish Enlightenment）的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及文學家。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沈金康博士

讚辭



唐代韓愈曾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香港自行車運動事業，可謂有沈金康博士，然後有自行車千里名將，此語實不為過。有高徒，必有名師，就如有千里馬，必有伯樂；香港有自行車名將，必有如沈博士的名師。沈博士的高徒李慧詩女士，曾從文字學的角度，以「承」字，巧妙的形容他們師徒關係，比喻恩師「在背後默默支持」。「承」字，早見於甲骨文，下從雙手，上從跪坐人形，意謂雙手抬起一人，如《說文解字》所云：「奉也，受也。」名師用心指導，視愛徒如子女，為他們開闢道路，指點方向，屢創輝煌成績。

「自行車」又稱為「單車」，無論稱呼沈金康博士為「最優秀的自行車運動員和教練」還是「最優秀的單車運動員和教練」，中國內地和香港體育界都絕對贊同，深孚眾望。沈博士1953年出生於上海，自幼就對自行車非常熱愛，二十歲由縣級自行車冠軍獲選拔為上海市自行車隊，未滿一年就獲選入國家隊，拿遍國內所有中長距離公路賽冠軍。可惜1980年一個清晨，在江蘇太倉訓練期間，遭遇車禍，為保護隊友，當時沒有躲開，而是選擇了急剎車，讓隊友安全通過，自己卻被撞傷，不幸失去左腿，被迫退役，運動員生涯戛然而止。沈博士意志堅定，鬥志頑強，認為「腿沒了，就要用腦」。車禍後的第三天，雖然仍然留院，但就捧起書本，準備高考，深明知識才能改革中國自行車運動的道理。一離開醫院，就去考高考，結果成功考進上海體育學院。

在本科修讀期間，沈博士才華出眾。本科畢業後，考上北京體育大學，獲碩士學位，深信「不能繼續做運動員，還可以選擇做教練，為國家奉獻一切的想法始終是第一位的」。在求學期間，邊進修邊執教上海隊，引進了血乳酸控制、心率監控、無線對講等先進技術，為上海隊贏取了大量金牌，取得驚人成就。他也撰寫論述心率控制訓練的論文，為自行車運動帶來革新概念，獲得體育科研最高獎項。嘗試在自行車運動訓練運用科技手段，沈博士可謂我國的第一人。

1985年，沈博士通過選舉獲滿票進入國家男子自行車隊，執掌主教練之職，這是國內體育界第一次公開投票選教練。翌年帶領國家隊遠赴漢城（首爾）亞運會，為國家隊贏得第一枚自行車亞運金牌，後來更獲聘為國家自行車隊總教練。在他的領導下，國家隊成了「亞洲霸主」。他憑著堅韌毅力，獨到眼光，為國爭光，從最優秀的自行車運動員成功轉為最優秀的自行車教練，實名不虛傳。

1994年是沈博士人生另一次重大變化，也是一次大考驗。當年受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委託，公派到香港半年，擔任香港隊客席教練，希望有助香港隊在廣島亞運會爭取前六名。當時香港隊沒有全職教練，也欠缺組織，再加上經費匱乏，訓練設施不足，條件極不理想。雖然如此，沈博士仍堅持理想，招收隊員，結果招了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一個全職運動員——黃金寶先生。為了讓家境清貧的黃先生專心訓練，沈博士把自己的工資給他分了一半，還找到自行車協會籌集工資。儘管條件艱辛，鍛鍊刻苦，沈博士用半年時間把黃先生訓練成才，在廣島亞運會公路賽獲得第四名，不負眾望。黃先生對沈博士說：「只要您當教練一天，我就跟您一天。」就是這一句話，沈博士決定留下，實現承諾。沈博士悉心栽培黃先生，不斷追求突破，讓他贏得「亞洲車神」稱號，成為體壇明星。沈黃師徒故事，為體壇佳話。

沈博士執教理念和風格以嚴格見稱，全心投入工作，甚至不眠不休，有「地獄式」訓練的要求，因而被稱為「魔鬼教練」。雖然要求嚴格，但體貼耐心，重視品格修養，以身作則，務求德術兼備，無論在生活上還是精神上，對麾下健兒默默支持，關懷備至，喻為「魔鬼手段，天使心腸」。在沈博士的提攜下，香港隊湧現出一大批年輕的傑出運動員，如陳振興、郭灝霆、黃蘊瑤、李慧詩等，在國內外自行車比賽中，各領風騷，提升了香港隊在國際體壇的地位，為香港創造奇蹟。

為肯定沈博士在體壇的傑出貢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1999年授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2006年授予榮譽勳章；2011年授予銅紫荊星章。此外，自2000年以來，沈博士多次獲得香港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優秀教練選舉的最佳教練獎，也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為本地體育發展策略和政策，費力勞心。

主席閣下，沈金康博士是優秀的運動員和教練，以科技知識提升運動水平，以寶貴實戰經驗鍛鍊人才。服務國家，為國人爭光，貢獻至鉅，戰績斐然。沈博士傳授精湛技藝，作風嚴謹，深受弟子尊崇。多年來提攜後進，無私奉獻，師德永銘，為運動健將之伯樂。師徒關係，可記之以「承」字。高徒有嚴師，嚴師育高徒，在體壇締造奇蹟。為表揚沈金康博士的卓越成就，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沈金康博士。

此讚辭由鄧思穎教授撰寫

榮譽法學博士

Steve Murray Smith爵士

讚辭



Steve Murray Smith爵士於1952年在英國諾域治（Norwich）出生。雙親來自勞動階層的他，少時就讀於諾域治市內一所官立文法學校。英格蘭的官立學校中，以文法學校對學術最為重視，收生要求尤為嚴謹，學生皆從全英十一歲或以上學童甄別試中精挑細選。此制度本不論出身背景，但求找出天資聰穎的兒童，因材施教，培養成材。得以躋身文法學校，誠然是一大成就，然而一次家長晚會上，Smith教授的班主任竟對他的父母說，像他們那樣的人都不會上大學，還不如為兒子找份合乎身分，不需甚麼技能的工作，讓他到附近的鞋廠洗洗地板之類。

為師者言，不見得句句顛撲不破，但如斯大謬，可說是世間罕有。幸好另一位老師別具慧眼，對當時終日在班上胡鬧的教授說，只要他修心養性，他朝必成大器。寥寥數語，改寫了教授一生。「人能勇往直前，靠的就是某時某地，某人給了你這麼一份信心。」教授回想過來，深有感悟。

升讀大學與否，往往受多種因素左右，當中師長的勸言，可謂一字千鈞。面對一方冷言冷語，一方鼓舞激勵，學生應何去何從？教授不走尋常路，決意在學術上更上層樓。一路走來，這個幾乎被制度遺棄的學生打破了班主任的論斷，更成為制度改革的先驅，奠定諸多影響深遠的政策。

教授起步於修咸頓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攻讀政治及國際關係學。本科畢業後，他在原校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前，他已是哈德斯菲爾德大學（Huddersfield）政治學講師。他及後回到諾域治，受聘於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該校成立於六十年代，乃學界一顆閃耀的新星。校園的中心是端正典雅、順理成章用作行政中樞的十七世紀老屋厄爾勒姆堂（Earlham Hall），但大學最為人熟悉的，終究是其現代建築。兩棟構成校園主體，分別有「教學長城」及「神塔」之稱的粗獷主義建築，均令人眼前一亮，一見難忘。

教授在那裏度過整個八十年代。除了別樹一幟的建築，令大學譽滿英倫的還有其創意寫作課程，和享負盛名的塞恩思伯里視覺藝術中心（Sainsbury Centre for Visual Arts）——中心為英國著名建築師Norman Foster早期公共建築作品之一，館藏甚殷。大學異彩紛呈，教授也在那

裏為人生寫下亮麗的一章。任職該校期間，他一共編撰九本著作。一如大學聲譽日隆，教授本人亦聲名鵲起，然而他在那裏的歲月，至此亦要告一段落。

九十年代初，教授轉往亞伯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任教。該校的校園也是廣受稱頌，其由Brenda Colvin設計的園景頗有名氣，只可惜Colvin於六十年代栽種的草木大多不復存在，餘下的亦瀕危失修。該校也是世上歷史最悠久的國際政治學系所在地。學系始創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旨在加深世人對時局的了解，從而減少衝突以至戰禍——人總得懷抱夢想的。

任職該校的十年間，教授出版了四本著作。最後一本為《世界政治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由他與John Baylis及Patricia Owens共同編撰，現已印至第八版，銷量逾六十萬。與此同時，該校的國際政治學系在教授領導下，在英國的大學研究評審機制中從第三級跳升至第五級，更於2001年奪得五星級殊榮。教授其後獲任命為威爾斯大學高級副校長（學術事務），他在大學的工作亦由管理個別學系，進而為大學整體學術發展策劃籌謀，其間大學於本土以至海外的威望日增。2002年，他出任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第六任校長，步入教學生涯新一階段。

埃克塞特原為羅馬軍團的一座要塞，其後蛻變為市鎮，以英國的標準，稱得上是古城。它現為德文郡的郡治，亦是座堂城市。其大教堂於1072年獲贈國寶《埃克塞特詩集》手稿，保存至今。詩集乃現存最完整的古英語文學總彙，一度塵封七百多年。

當地歷代主教佩玉鏗鏘，其中不少熱心教育，但善款每每並不原地灌溉。譬如Stapledon主教便

創辦了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Exeter College），Grandisson主教則於鄰近的奧特里聖瑪利鎮（Ottery St Mary）設立教團基金。後來埃克塞特幾間成立於十九世紀中的文理學院逐漸演化為一所大學，至1955年正式升格，比香港中文大學稍早誕生。

教授出任校長前，一直有批評指埃克塞特大學與英國另外幾間大學貴族化，來自官立學校的學生比例偏低。教授在求職面試中抽絲剝繭，剖析大學現況，闡述校方應發展的路向。來到十八年後的今日，大學煥然一新。其學生人數攀升近倍，國際學生也大為增加。此外，大學涉足STEM（科學、科技、工程學和數學）學科，排名亦穩步上揚。而為了配合這些發展，大學積極擴建校園，並開設更多宿位——容我申報利益，小兒也是埃克塞特大學校友，曾在位處康和（Cornwall），於2004年啓用的彭林校園（Penryn campus）上學。

除了着力招收海外學生，埃克塞特大學亦四出締結國際院校聯盟。它與中大合作，成立香港中文大學—埃克塞特大學環境持續與應變聯合研究中心，正可見其願景。群策群力，對控制氣候變化至關重要。埃克塞特大學深明此理，樂與世人並肩攜手，聚力成事。

教授在改革大學之餘，亦留心國家整體的大學制度，積極參與其中。他的本業與公職各佔不少時間和精力，看似有所衝突，但它們其實息息相關。一校之政，往往取決於整套教育制度的操作。從培育中學生，到大學收生制度，以至高等教育界各種架構、資源分配、取向和政策，皆與校政緊扣。論及教授肩負的眾多公職，當數由英國首相成立，就如何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世界級教育向政府建言的國家卓越教育評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Excellence）。

教授亦曾為全英大學校長聯會（Universities UK）主席，另擔任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董事會主席，監督全英高等院校招生事宜，兼為有意報讀大學的學生提供輔導。多年下來，這些工作改變了英國整套教育制度。

教授的豐功偉績，為他從海內外帶來無數榮譽學位和獎項，其中國際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Susan Strange Award，不得不提。獎項嘉許敢於挑戰成例，推陳出新的學者，更顯彌足珍貴。教授亦是英國皇家文藝學會（Royal Society of Arts）及社會科學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院士。2011年，他名列英女皇壽辰授勳名單，獲封爵士。

教授於2020年9月退任校長，繼任人選亦已公布。對各地大學而言，此誠風雨飄搖之際。尚幸教授把大學辦得妥妥帖帖，並覓得新女校長接任，這也是一項成就。

教授多年來不憚勞苦，克盡己任，現似是頤養天年的時候。然而他睿智過人，想必對退休生活的逸樂，戒慎恐懼。卸任校長後，他將擔任英國新開設的海外教育專員（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hampion）一職。教育也者，理應普及眾生。從當年在諾域治的一場家長會開始，教授披荊斬棘，屢建新猷，一路培德育才，惠澤茂焉，業界同仁、莘莘學子，自當銘感不忘。

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銜予 Steve Murray Smith爵士。